

ZHIDU JIANSHE YU REN DE ZIYOU QUANMIAN FAZHAN

制度建设与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

徐 斌 \ 著 ■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建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徐 斌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ISBN 978-7-01-010814-8

I. ①制… II. ①徐… III. ①社会主义制度-制度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0903 号

制度建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ZHIDU JIANSHE YU REN DE ZIYOU QUANMIAN FAZHAN

徐 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数:31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0814-8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论 制度建设的时代与人的发展	1
一、问题的提出:由制度改革到制度建设	1
二、制度建设范式的哲学思维	12
三、制度建设的内涵及其分析	17
四、在人学和制度建设的相互观照中深入研究	19
五、人学与制度建设相互观照的方法论反思	21
第一章 制度与制度建设	24
一、制度的概念阐释和起源追问	25
(一)制度的概念阐释	25
(二)制度构成	29
(三)制度起源	32
二、制度的本质特征、功能及其局限性	40
(一)制度的本质特征	40
(二)制度的功能	46
(三)制度的局限性	50
三、制度建设的规律及评价尺度	52
(一)制度建设的规律	52
(二)制度建设的评价尺度	57
四、中国道路的核心是中国制度	60
(一)由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到中国制度	60
(二)当代中国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关系	62
第二章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	64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阐释	65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观点	65
(二)现实的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据	71
(三)需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标志和动力	75
(四)自由时间:人的发展的空间	84
(五)社会分工:在劳动专业化中推动人的发展	86
二、主体性的确立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点	89
(一)在阶级社会中拥有土地资本才有真正的主体性	90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的 发展	91
三、世界历史性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境遇	92
(一)文艺复兴运动发现了世界、发现了人	92
(二)“世界历史”促进了人的发展	93
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特征	97
(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97
(二)人类发展不断上升前进的趋势与发展过程的曲折性相 统一	99
(三)历史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102
(四)个体发展和整体发展的统一	103
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	105
(一)实践活动、交往关系和人的发展相互作用的规律	105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程度和社会文明成果、个人对社会 文明成果的占有程度及占有方式相联系的规律	108
(三)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规律	110
(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规律	114
第三章 制度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119
一、理论分析:制度建设与人的发展的互动	120
(一)制度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作用	121
(二)人的发展对制度建设的作用	129

二、历史考察:制度变革与人的发展相互作用的历程	132
(一)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人的发展状况:原始的丰富· 人的依赖关系·自然的个人	133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状况:畸形发展·人的 独立性·利己主义	136
(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人的发展状况:全面发展·自由 个性·个人和社会的一致	147
三、社会实践:制度建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互作用的基石	153
(一)社会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154
(二)社会实践是制度建设与人的发展的基本方式	157
(三)社会实践促进了人的发展和制度建设	160
四、文化:制度建设与人的发展相互作用的中介	167
(一)制度是一种文化存在	167
(二)制度塑造了一种文化环境,成为人的发展的外部精神 条件	169
(三)人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文化,从而引导制度建设	171
第四章 制度建设的主体是人	174
一、当前社会的利益结构是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	176
(一)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析	176
(二)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对当代制度建设的不同作用	180
二、批判与建构:人在制度建设中的理论建构作用	184
(一)制度批判:制度建设的前提	184
(二)制度需求:制度建构的根据	188
(三)制度选择:制度建设方式的取舍	189
(四)制度建构:制度建设的理性创新	191
三、制度实践:人的本质的确证与塑造	200
(一)制度建设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得到表现和确证	201
(二)在制度建设实践中人本身得到塑造和发展	204
四、制度评价与制度成果享用:制度建设的价值确立	206

(一) 制度评价:制度实践的效果判断	206
(二) 制度成果享用:制度建设的价值目标	209
五、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必须提高人的素质	210
(一) 重要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	211
(二) 关键是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	215
(三) 培育制度意识,形成制度思维方式	219
第五章 当代中国制度建设的维度与目标	226
一、当代中国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227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制度治理理念	228
(二) 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需要制度	228
(三) 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制度	229
二、制度建设:由解放人、发展人到建设人、发展人	233
三、自主、平等:经济制度建设的基点与理念	235
(一) 经济制度改革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	236
(二) 经济制度建设面对的问题与对策	244
四、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建设的价值追求	258
(一) 民主与自由的意涵	259
(二) 民主自由是历史性的价值追求	263
(三) 正义是政治制度建设的首要价值	268
(四) 民主自由是政治制度建设的价值目标	277
五、和谐、均衡:社会制度建设的现实目标、方式	290
(一) 何谓和谐? 何谓均衡?	291
(二) 社会制度建设的目标和方式是实现社会和谐、关系 均衡	293
(三) 社会制度建设的原则与方式	300
结语 走出制度的神话	308
 主要参考文献	 319
后 记	325

导论 制度建设的时代与人的发展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

一、问题的提出:由制度改革到制度建设

制度在每个社会都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①的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是制度变革的历史,每一代人不仅比前一代发现了实践活动的更有效的方法,也形成了更好的制度形式,同时也不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②当代中国改革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

(一)当代中国制度改革与人的发展的历史和现实

当代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给中国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变化,但主要集中在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32 页。

在两个方面，即经济增长和人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但更重要的改革成果是促进了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体现为人的本质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也就是说，我们应在历史发展与现实实践中考察人、把握人。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就是我们研究人的本质、具体的人性、人的需要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大背景。可以说，一方面，当代中国的改革促发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精神状态的变化；另一方面，人的不断发展也对推动制度创新、谋划改革策略、实施改革方案、检测改革效果起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的历史是：从经济运行方式来看，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传统计划经济的过程；从政府治理方式来看，是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的过程；从文化形态来看，是从注重本质到注重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过程；从社会交往形式来看，是从依靠人情信誉的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的过程；从人的存在方式来看，是从人对人的依赖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过渡的过程。所有这一切会聚成时代精神之变革，共同构成当代中国制度建设的历史方位和社会背景。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的发展也相应地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人的思想解放、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展开。

当代中国的改革启动的思想前提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是当代中国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人的发展的第一次飞跃。1978年以后，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非人性的灾难，谴责它对人性、人道主义的粗暴践踏。“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和力量之大，是令人震惊的。这个严重后果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人崇拜统治了人们的思想。因此，客观地厘清历史，寻找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首先要破除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人们头脑的个人崇拜。这样,“真理标准”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意义。这次大讨论的直接结果是,人们解放了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解放思想,本质上是解放人。“大讨论”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清除了思想障碍,又对人的独立意识、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起了积极的前提性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巩固和深化了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并使之体现于政治路线和决策之中。它确立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加快经济建设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即“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于是,改革分三个阶段层次递进地展开,人在推进改革中,本身也得到了发展。

第一阶段(1979—1984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动力是人们生存的欲望。改革开放以前,农村人民公社由于其固有的体制弊病,已经无法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农村的集体生产甚至不能满足人们最低的生存需要。生存的现实迫使人们摒弃人民公社的“神圣”选择,代之以具有激励功能、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除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外,还包括调整农产品价格和实施旨在促进自由市场形成的政策。可以说,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是继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的第二次解放,它使农民生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获得空前的提高。其显著的成效是,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年平均增长7.98%。这是在农业人员、资源、技术、工具基本未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进而改变农民的生产态度而实现的生产增长。农村改革的初步成果证明,改变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劳动方式、经营方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虽然这时的改革还只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某种改变,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转向市场经济改革的序曲。

1984年,中国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的过渡性阶段。第一阶段的改革虽然给停滞的经济注入了一些活力,但它实质上还只是对计划经济的改善,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问题仍未解决。另外,农村改革的成果却给人们以启示:“大多数人从经济自由和自

主决策的机会中得到好处,维护中央计划经济的旧观念就日益失去意义。”^①同一时空下,农村改革的积极成果与城市工业发展滞后正反两方面的现实,对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展开,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性的支持。此后,以城市工业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陆续展开,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了突破性的扩展与深入,它更明显地趋向以市场为导向,由市场决定经济活动。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促进了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人的塑造——即将计划经济中高度专门化的人转变为市场经济中自主的、适应自由选择和有序竞争的人——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因素。人在经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

中国的改革在1989年后进入平缓期,“左”的思想一度抬头,他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人们的观念中还纠缠着姓“社”、姓“资”的矛盾,中国的改革存在裹足不前的倾向。为了推动中国改革继续前行,1992年年初,他发表了南方讲话,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也推动了人的发展的新跃迁。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②。“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③他的讲话否定了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的教条主义观念,对推进改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改革获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的目标,当代中国的改革也由此进入第三阶段。

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人们彻底告别了计划经济。它不仅是一场经济体制的革命,更是一场彻底的人的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体现了改革本身运演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又是肯定人们的需要满足和

① [美]王辉:《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利益追求合理性的体制,它是现阶段最适合人性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因为改革开放最初十多年的改革使人们同时体悟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所以,市场经济是符合人们意愿的主动选择。它是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的统一,是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符合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即按照自由、平等、竞争的原则参与市场活动。人成为自己经济活动的主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活动方式,发挥才智,发展能力和个性。同时,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扩大了人们的活动空间,有利于促生人的普遍交往体系,发展人的需要的全面体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使人们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提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我们取得了重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其中有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基本制度通过建立其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体现出来并在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作用。

道路是发展路径和目标,它解决的是中国社会往哪里走的问题;理论是指导思想、旗帜原则,解决的是中国社会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制度则是行动纲领与行为准则,解决的是让中国的建设事业从理念走向实践,从理论变为行动的保障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键是突出了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对道路探索的经验总结,是对理论体系的肯定和逐步现实化,是对当代中国制度改革成果的概括和提

升。改革和发展的方式与目标由“摸着石头过河”的边实践边探索边反思总结到形成体系框架,制度的确立使我们的发展明确了规范和发展路径,表明我们更加自觉、更加坚定、更加自信。它的制度逻辑究其本质来讲,是有利于保证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制度是经验的凝结抽象,经验是实践的理论概括,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这是因为制度的形成是需要条件、需要积累的,实践的深化是制度成型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进行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在改革中,我们不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汲取了以往制度改革的一些教训,不搞制度“大跃进”,不搞制度“乌托邦”,不抽象地对待制度,把制度改革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与运用之上,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实践,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制度的确立是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果的肯定和继续推进制度建设的保障。这些成果表现为:一是物质生产成就巨大。最近 20 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9%,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需要层次不断提高,成功使 5 亿人脱贫,等等;二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得到很大改进,实行了新的更有效的经济政治社会运行模式,构建了更开放的经济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获得了更进步的思想与理念,价值追求更趋多元化,更加尊重人的个性、他人的权利和公共利益,等等,这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的结果。但继续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还需要我们确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制度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则是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就经济制度而言,从农民自发地改变经营方式,到政府自觉地但试探性地实行新经济发展政策,再到坚决大胆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最有效的经济运行方式,我们应该不断完善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继续加快推进,要推动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要建设民主政治制度,使民主形式更丰富、民主渠道更畅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得到落实,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保障。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让我们有了一个大体的制度框架与制度轮廓,让我们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方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但制度的确立并不等于制度的定型。我们需要在制度建设中,推动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的具体的制度形式革除落后的形式,用善的制度环境来取代恶的制度环境,用科学设计的制度变迁路径来替代主观臆想的制度变迁路径,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科学、健康、规范、进步的制度保障。

(三)注重制度建设的时代

30多年来,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基本手段是制度改革。通过改革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改革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人的发展。它激发了人们满足需要、追求个人利益的热情,扩展了人们社会交往的范围和视野,提高了社会实践能力,激发了人们的精神状态。我们已经摒弃了高度集中的旧体制,逐步消除了旧体制的影响,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我们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工作重点应该指向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基本手段就是制度建设。我们已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制度保障。

制度变革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但也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人类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二是贫富差距扩大,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人的发展水平的差距拉大。这一不良后果与我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有关,我们发展观的变化说明了对发展问题的认识历程:从发展=经济增长即GDP的增加到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从发展=合理+可持续发展到

发展=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发展。改革发展的这个过程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没有也不可能自动带来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人性和谐发展;相反,还造成了负面效果。社会的和谐发展要求我们要致力于制度建设,重视制度与人的发展的关系,要求我们从社会公平、人性要求、人的发展的角度解析制度、推进制度建设。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由制度改革时代进入制度建设时代。其原因是:第一,时代任务的转换。制度改革是我们的第一次转型,即摒弃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任务已经初步完成,现在我们正进入第二次转型。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已经发生变化,由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变为建设新制度,角色也应该由制度改革者变为制度建设者,由否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更重视社会公平,以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次转型,即制度改革的过程,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第二次转型,即制度建设的阶段,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社会公平、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党通过认真反思、开始正视中国 30 多年制度改革发生的深刻变化,并试图从政党执政方式、工作重点乃至性质上逐渐适应这一转型。

改革之初,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这次转换相对容易和成功,因为这是一个每个人的利益和整体利益增加的改革;而由制度改革到制度建设的转型,会更加艰难,矛盾重重,因为这是利益的调整。其间有领导集体的权威作用使然,同时也与制度建设本身的逻辑更为复杂有关。改革基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满足和利益追求,容易得到共识,得到人们的支持,但制度建设是要寻求社会公正,是要限制既得利益者,是要规范权贵的利益和行为,所以,制度建设工作更为艰难。

第二,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社会不稳定状态,社会持续发展既需要建立动力机制,也需要建立平衡机制。30 多年的制度改革凸显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地导致社会公正、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令人振奋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经济发展反而是以贫富差距为代价,贫

富差距过大导致了更激烈、更严重的社会矛盾。在社会改革和发展中形成了利益群体多元化,各利益群体的诉求和意志差别很大,往往难以形成改革和发展共识。朱镕基曾说过:“我8年来的体会,就是要办一件事,不开8次、10次会议就没法落实。如果发一个文件,能兑现20%就算成功了,不检查落实根本不行。”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在内耗中失去平衡,损害社会发展的成果。弱势群体又以其强势资源优势获取更大利益,更导致了社会不公。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不仅仅是伦理问题,更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和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表面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下也许隐藏着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它随时可能以一定的诱因为导火索爆发,那就可能造成社会秩序的颠覆。当前社会对“官二代”、“富二代”的称谓以及“拼爹”游戏嘲讽实际反映了对社会特权、社会秩序和社会体制的不满。社会上层制定游戏规则、操控游戏过程,中间阶层而没有名爹的人,也想尽办法加入这个游戏,来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孩子,努力往上晋升,底层的人没有玩这个游戏的资格,他们会愤怒与怨恨。你如果在大街上跟人吵架,只要骂他说你这个“富二代”或“官二代”,旁边一定有人马上过来帮你。近年来在中国的暴力群体性事件中有许多是属于“社会泄愤”性质,亦即骚动者并非事件直接受害者,但充满严重仇恨情绪,这是社会分化的生活效应。

在改革中,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辛勤劳动先富起来,只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和必经阶段,最终应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早就警告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会出乱子。”^①解决这些矛盾不能只靠把蛋糕做大,更要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更完善和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人民民主参与制度,从制度上解决矛盾。

第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制度变革、制度建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诉求、终极目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的界定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是物质生产劳动,其具体表现形式则是制度变革、制度建设,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只能在制度变革、制度建设中实现。

但这个目标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达到的,要经历长期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直线式发展的,而是螺旋式前进的,通常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赋予个人主体地位,使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充分地发挥自觉性和创造性,但主体的素质和各方面能力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现象:每个个体获取了个人利益,但有时候被贪欲支配,对金钱、名誉、权力的追逐使人丧失自我发展的理性和原则;一些人的发展以另一些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代价,某些人的享受以牺牲社会整体的发展为代价;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敌视、相互损害付出全体人的发展的代价。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需要我们注重制度建设,以规范有效的制度建设克服制度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当然,制度的特点是严肃性、规范性、秩序性和普遍性,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的活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的自由,但这种限制是个人更好的发展的前提,是不妨碍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保障。所以,以制度建设对极端个人行为的限制和规范,正是有利于促进他的持续发展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第四,加强制度建设是实现国家制度现代化的需要。制度的改革和不断优化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重要保障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使命就是指导无产阶级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国家现代化可以大致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现代化,二是制度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就是构建现代社会制度体系,使权力运行规范化、制度化、效率化、公开化,以制度保障社会运行体现民主意志、民主权利,保障国家利益最大化,全体人民福利最大化。制度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没有制度现代化就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党和政府发动和积极推动了经济现代化,进行制度改革,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在需要继续领导和指导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社会主义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推动制度现代化。美国学者福山的观点告诉了我们制度现代化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人们交往的对象由熟人扩展到更多的陌生人,只靠人际关系去维持信任已变得很不可靠了,制度才能使信任更持久、更坚实。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崛起和持续发展的根本。有关资料显示,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以后,中国却急速衰落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少制度创新。缺少有活力的、有竞争力的国家制度,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那就是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①因此,当代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

第五,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重大转型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型,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第一次转型,由革命型政党到发展型政党。现在中国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第二次转型的成功和效果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再次转型,即从行政方式统治到政治方式统治,从直接政府统治到间接统治,从社会改革到社会管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主动和成功转型要依靠制度建设的成效。行政方式统治、直接政府统治的统治方式更多地体现政府权威,体现具体运作者的个人意志,而政治方法统治形式的构建,间接统治的过渡,需要我们党摒弃人治的执政方式,构建依靠制度治理的模式。加强社会管理,纾解社会矛盾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大课题,而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最根本的就是进行社会管理制度创新,以规范有效的制度规定管理者的行为边界和行动准则。

^① 郑永年:《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载《联合早报》2008年3月4日。